

50 年来的孙中山研究*

王 杰

孙中山研究 50 年的历程, 总体来说逐步深入发展的, 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以下依序予以介绍。

第一阶段(1949- 1966 年)

此一阶段, 研究者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事业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56 年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 高度赞扬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和对后世的影响, 既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也被奉为圭臬。1961 年的“纪念辛亥革命 50 周年学术讨论会”, 有力地推动了孙中山研究。1949- 1966 年间祖国大陆发表有关研究论文近 200 篇, 专著则有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

这一阶段研究得比较深入的问题有三: 早期思想与活动; 三民主义的形成、内涵及意义; 哲学思想。

(一) 早期思想与活动

关于孙中山早期的思想, 多数学者认为它是革命和改良的混

* 参加本文撰写的有陈志雄、李振武、刘志强、张军民、张金超、刘海彬、谢淑娟等同志, 谨志谢忱。

合体, 争论的焦点有二: (1) 改良因素和革命因素何者占主导地位? 有人曰: 孙氏要求革新政治, 发展资本主义, “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虽含有改良主义的成分, 但已脱离改良主义的范畴, 产生了革命的要求, 不能因为其某些思想与改良主义者类似而断定他在甲午战争以前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有人曰: 1895年前孙氏“改良主义思想仍然是主要的”。(2) 革命思想的确立是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是之后? 一说 1895年前孙氏已初具反清革命思想, 兴中会的成立和革命纲领的提出, 是其“革命活动的开始”; 一说兴中会成立时其“革命思想比改良思想占了较大比重”, 但直到 1900 年惠州起义, “他思想中的革命因素才处于压倒性的主体地位”。

(二) 三民主义

学者们赞成毛泽东对三民主义的定性, 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分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两个时期。但在分析、阐释其形成、内涵及意义时, 存有歧见。

1、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民族压迫的社会条件中产生的”, 反映了全国人民反清反侵略的民族革命的要求。孙氏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无反帝思想? 有人曰: 其在辛亥前已产生了反帝思想, 辛亥后的革命斗争实践, 使之逐步确立起来; 有人曰: 辛亥时期其民族主义缺乏明确的、彻底的和坚决的

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活动》,《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段云章:《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

李时岳:《孙中山的道路》,《史学集刊》1956年第2期。

秦如藩:《二十世纪前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2页。

江海澄:《试论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山东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没有提出有力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和口号。关于“大亚洲主义”,有论者认为它的主张趋向是反对帝国主义,提倡一种与西方列强的“霸道文化”相对立的观念,实质上并不具有狭隘的地域性和种族性,其缺陷在于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也有论者认为,孙氏试图藉“大亚洲主义”联合日本以抵抗欧美列强的侵略,乃未认清日帝之本性,无异于与虎谋皮。关于“反满”问题,有人认为它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使其革命带上了浓厚的种族革命的色彩,此乃民族主义的一个缺陷;有人认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辛亥时期的反满“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 民权主义。学者的分歧集中在对“五权宪法”和“建国大纲”思想的评价上。有人认为:建国三时期,权能分开,是英雄创造历史而人民群众只能是盲目随从的唯心主义观点;五权宪法也不能补三权分立之弊。有人则认为:民权理论的内容“虽然存在着不依靠群众的严重弱点,但其主观目的是好的,这一整套建立共和国的方案大大地提高了革命党人的思想水平,解决了当时革命运动的关键问题”。

3. 民生主义。对孙氏为何提倡“平均地权”,有说是“由于对中国农民痛苦遭遇的恳切同情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刺激”。有说

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李光灿:《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新建设》1956年第12期。

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

李光灿:《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李时岳:《孙中山的道路》,《史学集刊》1956年第2期。

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活动》,《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孙氏希望以此来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激发会党群众参加革命。有的强调孙氏是想借此解决社会发展后因私人垄断土地而产生的特权问题, 以防止第二次革命的发生。关于思想渊源, 有曰“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土地纲领和九十年代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其最重要和最直接的思想渊源; 亨利·乔治的‘社会主义’则几乎成为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办法, 与此同时, 也应该充分看到马克思主义对孙的影响。”有曰其渊源主要是西方的土地国有学说, 以亨利·乔治的理论为基础, 吸取了约翰·穆勒的方案。有曰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无疑起着相当影响。对“平均地权”的评价, 论者多以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所作的评论为指针, 但在具体阐释其性质、作用时, 有曰它“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 既反映了中国社会需要发展近代工业的客观要求, 同时反映了中国人民不愿走西方国家发展近代工业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的美好愿望”。它代表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下层劳动群众的利益, 是当时最革命、最激进的主张。有曰: 希望以平均地权, “不触动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而解决土地问题, 事实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关于新民生主义, 论者认为它“锐利地把发展中国经济问题归结为必须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问题。前期游移不定的‘耕者有其田’的急进主张, 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确定下来, 并变为具体的政纲了。”“就世界意义说, 是最邻近马

苑书义:《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历史教学》1955年第8期。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页。

李泽厚:《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李时岳:《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的产生和发展》,1955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

来新夏:《同盟会及其政纲》,《历史教学》1955年第6期。

李光灿:《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新建设》1956年第12期。

克思主义的最后一种空想社会主义”。

(三) 哲学思想

孙氏哲学思想庞杂而又充满矛盾, 含有不同程度的辩证唯物主义因素, 这是研究者的共识。但其究竟是以唯物主义、还是以唯心主义为主? 有的认为其“紧紧接近于唯物主义, 虽有唯心主义的成分, 毕竟是次要的”。它鲜明的唯物主义特色体现在: “以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为其主要内涵的方法论; 以近代自然科学素材为基础而形成的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自然观; 以革命实践中的直接经验为主要源泉的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认识论; 以二元论为其特色的社会历史观——民生史观。”有的认为其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因素并未占到主要的地位, 这体现在: 世界观是二元论的, 或者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摇摆, “时常倾向于唯心论的发挥”; 在回答世界起源和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 虽“对于物质是肯定的, 而对于精神则强调得更多一些”, “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圈子”; 认识论“带有很大的矛盾色彩”, “动摇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对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 论者多认同毛泽东“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 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的论断, 但在阐释其作用时持论不同。一曰: “‘人类求生存’的原则, 是脱离具体的社会积极形态的, 即没有物质基础的空中楼阁”; 一曰“这种观点含有某些唯物主义的因素, 有它正确的地方, 而且在当时的历

李泽厚:《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侯外庐:《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同政治思想的关系》,《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张磊:《略论孙中山的社会历史观》,《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

郑鹤声:《试论孙中山思想的发展道路》,《文史哲》1954年第4期。

杨正典:《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1期。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81页。

李光灿、郭云鹏:《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第4期。

史条件下起了积极作用”。

“文革”前孙中山研究的状况,具以下特点:(1)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的研究方法;(2)从总体上看,研究以定性为主,缺少量化分析,呈现出粗线条、轮廓式的特色;(3)思想研究多于实践研究,这或许缘于原始资料尚待挖掘。

第二阶段(1976- 1984年)

十年“文革”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文革”结束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孙中山研究从省思步入复苏期。

以1979年冬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为契机,继之受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推动,孙中山研究日渐“兴奋”起来,一批成果相继问世:魏宏运的《孙中山年谱》,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等著的《孙中山年谱》,尚明轩的《孙中山传》,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李时岳、赵矢元的《孙中山和中国民主革命》,肖万源的《孙中山哲学思想》,韦杰廷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王志光的《孙中山的反帝思想》,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1编,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第1册以及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反映了研究的新进展。有关论文的刊发开始升温,研究较前广泛、深入,具拓展性。《孙中山全集》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多种有关的档案、史料专辑相继出版。此外,全国和地方性的孙中山研究学会亦陆续成立。此期间的论争则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三民主义

何练成:《试论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1、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其“主要是用西欧、美国、日本的资产阶级思想革新了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而形成的”。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吸收了列宁的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民族纲领”,加以改造而成的。针对前此争论激烈的“反满”口号,论者指出“排满”实质上成为反帝、反封建、反君主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战斗口号。还有论者提出“孙中山对‘五族共和’的态度是:始则怀疑,继则附和,终于批判”;其真实主张是“带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标记”的“实行种族同化”。

2、民权主义。论者多着墨于民主共和国思想,指出它“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也给了那个时代以巨大影响”。认为视五权宪法为“消极因素”,“不太公允”,建国三时期的“训政”,实质上是为革命专政与民主宪政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3、民生主义。论者认为孙氏的经济建设思想“带有强烈独立自主、民族解放性质”,包括四项原则——“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二项中心主旨——“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二重革命——“产业革命与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同时并举”;具体做法是“全国统筹,交通先行”;“利用外资,确保主权”。其思想可分两段:1919年前,是空想的、主观的、感情的社会主义者;国民党改组后,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者”。

章开沅:《“排满”与民族运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张正明等:《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李华兴:《评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陈可青:《试论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经济研究》1980年第2期。

朱伯康:《孙中山关于经济建设的设想》,《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

何振东:《评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学说》,《徐州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二) 哲学思想

哲学思想研究的重心已从辨析其属性拓展到对具体内容的探析。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孙氏把它们看作“不是‘绝对分离’的关系,而是既对立又合一的关系”。有的强调孙中山的宇宙观是物质和精神“二者并重的二元论”,“必然要陷入唯心主义”。关于知行观,有的认为孙中山“提出了‘先有事实,后有言论’;‘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的基本上带有辩证法因素的认识论和知行观,然后用以指导行动”,这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社会历史观的一个突破”。有的指出“孙中山始终把‘行’和‘事实’作为思想产生的基础”,“这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就是孙氏所说的“天生之智”论,也“合乎实际的科学道理”,“不能轻率地断定为唯心主义”。也有论者认为孙氏的认识论和知行观“具有严重的形而上学缺点”。

(三) 专题研究

1、与武昌起义的关系。有的说孙中山等对武昌起义的爆发和整个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有的则从起义仍把孙氏“当作革命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群众和组织群众”,孙“通过同盟会领导”,以及其思想、同盟会的纲领、方略对武昌起义的指导作用等方面,来论证他对武昌起义的领导和指导作用。

韦杰廷:《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01 页。

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95- 396 页。

肖万源:《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6 页。

袁伟时:《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中山大学学报》1979 年第 4 期。

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40- 341 页。

笠柏松:《关于武昌起义的领导问题》,《江汉论坛》1981 年第 5 期。

彭明:《论南京临时政府》,《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3 期。

2. 让位于袁世凯。有说孙氏主政临时政府时虽对袁世凯有妥协,但始终坚持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原则和立场,“就其本质和主流来说,不是妥协退让史,而是革命斗争史”;有说让位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最后完成”。在探讨让位原因时,或着墨客观条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力量之间的对比,即革命的力量过于弱小,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所决定的”;或强调主观因素,说孙氏错误地抱着“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方针;或说是孙氏厌薄权势利禄,或说是迫于形势采取的“对付袁世凯的革命策略灵活之运用”。在评价让位利弊时,有说“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有说“是正确与错误交织,成功与失败并存”,功过各半。

3. “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及护法运动。论者指出,孙氏是宋案后“党人中最先觉悟和主张武力讨袁”者,“是‘二次革命’的策动者和精神领袖”,其斗争乃“保卫辛亥革命成果,抵抗北洋军阀反革命暴力的义战”。关于中华革命党,论者既指出其缺陷,也肯定它“在党的纲领、武装斗争等方面,较之国民党有所前进”;“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粗具全国规模的革命政党”。¹⁰ 有的论

陈胜彝:《论孙中山创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徐梁伯:《应该重新评价“孙中山让位”》,《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4期。

金冲及、胡绳武:《论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宝成关:《论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

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

肖万源:《孙中山哲学思想》,第56页。

彭大雍:《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思想基础》,1983年4月6日《光明日报》。

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页。

赵朱元:《辛亥革命至“二次革命”之间的孙中山》,《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5期。

10 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第489-491页。

者认为该党是革命低潮时的反袁旗帜,同时又指出其不足:“纲领——缺乏号召力;党务——未能广泛地团结同盟军;军事——没有依靠和发动群众”,是一个“秘密结社性质”的“排他性”团体。关于该党的作用,有说“孙中山是护国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是护国运动中最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但因其军事力量有限,“没有能掌握运动的领导权”。有说其只是“倒袁高潮的配角”;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取得了反袁世凯的领导地位”。关于护法运动,一是肯定了孙氏揭举护法旗帜,维护“主权在民”的最高原则,反对军阀割据和混战的意义;二是对孙氏和陈炯明、唐继尧、陆荣廷、段祺瑞、张作霖等的关系作了较前深入的探讨。

4. 国民党“一大”和第一次国共合作。论者赞扬了孙氏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伟大功勋,指出召开国民党“一大”,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为‘摆脱艰难顿挫’的困境,继续前进,开创新的革命局面,采取的一项极为重大的英明战略决策”;“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高潮,由此澎湃而起”;国共合作“正是我们民族团结、奋起的一种有效形式”。

这一阶段的研究,具以下特点:(1)对孙氏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较前更为具体细致;(2)将孙氏思想置于更为广阔背景下进行论述,题材较宽广;(3)专题性研究日渐深入;(4)一批中青年

王杰:《中华革命党略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1983年版。

谢本书等:《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8页。

陆仁:《历史的必然,革命的需要》,刘大年:《序言》,均载《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学者在前辈的奖掖下,崭露头角。但对孙氏生平各个阶段的研究还不平衡,研究深度尚显不够,研究队伍仍处于自发状态。值得欣慰的是,这些不足已经引起识者的重视,为此后的拓展埋下伏笔。

第三阶段(1985- 1990 年)

这一阶段可谓孙中山研究的繁荣时期,热潮迭起。1985 年的“回顾与展望——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总结了研究的现状,对深入研究提出了导向性的建议,堪称研究的一个里程碑。1986 年的“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国际学术讨论会”,论题涉及面较广,专题研究色彩较浓,且采用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使一些理论问题得以突破或深化。1990 年的“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实现了两岸学者的面对面交流,大家秉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切磋学问。此期间主要论争如下:

(一) 家世源流

孙氏祖籍,新中国成立前即存在“紫金”与“东莞”两说。有论者以大量可靠的文物资料证明罗香林的“国父上世源出于广东紫金”说不能成立,认定翠亨孙氏源出东莞。但仍有人重申“孙中山是客家人,祖籍在紫金”。应该说,“东莞说”较为真实可信。

(二) 三大政策

关于三大政策的提出及其概念的形成,有云:“一是受各被压迫阶级民主统一战线形成的必然趋势所激发”,“二是受新时代潮流所促动”;孙氏在制订“一大”宣言的过程中“对联俄、联共、扶

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86 年第 4 期。

林家有、周兴樑:《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1、113 页。

助农工这三件事都是确认了的”，但“并没有把这三者联成一个整体，概括为‘三大政策’予以宣布”，“这种概括工作是由共产党人完成的”。“但它的形成也包含着国民党人探讨的成分。”

(三) 民生主义(社会主义)

论者多认为民生主义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其形成主要接受了亨利·乔治的影响，与他的学说具有共同的特征：“一、基本上不触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二、发挥国家的调节职能，促使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三、实行分配领域的改革，防止贫富差异的扩大”。持异见者认为，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是一个折衷的、温和的改良主义方案，较之亨利·乔治显然又有所后退”。

(四) 与近代军阀的关系

这个问题是研究中的难点。有论者指出孙氏对军阀的认识经历了由对某一个军阀认识不清到逐渐认识，进而到对整个军阀集团面目的清醒认识的过程。孙氏与军阀的合作，有幻想的成分，也有策略的运用，越到后期，幻想成分越少，策略的运用越占主要地位，直至提出打倒军阀及其后台帝国主义的主张，反映了他的彻底觉醒。有的论者以西南军阀为个案，指出孙氏正是经历了多次的反复与挫折，才抛弃了对西南军阀的幻想，转而寻求新的道路和力量。

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鲁振祥：《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 年第 6 期。

夏良才：《论孙中山与亨利·乔治》，《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6 期。

杨天石：《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册。

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谢本书：《孙中山与西南军阀》，《云南社会科学》1985 年第 3 期。

(五) 亚洲观与国际观

孙氏的亚洲观,可表述为:(1)亚洲的复兴是必然趋势;(2)振兴亚洲是亚洲人的责任;(3)解决中国问题是复兴亚洲的第一步;(4)特别注重“中日合作”、“中日联盟”。其国际观主要由三个层面构成:思想上以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为导向;策略上以争取列强不干涉乃至支持中国革命为重心;行动上以寻求列强物质援助为重点。这种强国中心取向,是为中国革命争取最大便利,并有助于世界上一切民族的独立解放。因此孙氏始终坚持两条原则:利用强权以打破强权;支持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关于“大亚洲主义”,有人将其誉为“孙文学说关于东西方文化和亚洲问题的总纲”;“实质上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矛盾、冲突和斗争问题”;持异议者认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遗产,既有积极意义又带消极意义”;它是孙氏兴亚思想的核心,其本质有别于日本国权主义者的观点,但其本身并不是一个严密完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

(六) 文化思想

在这个问题上分歧颇大。关于其构成的特点,有论者归纳为“因袭”、“规抚”与“创获”,指出孙氏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没有完全脱离“中体西用”的窠臼。有说他对于传统文化有一个从

陈锡祺:《孙中山亚洲观论纲》,《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桑兵:《试论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亚洲观》,《“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唐上意:《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论纲》,《“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李吉奎:《试论孙中山的兴亚思想与日本的关系》,《“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陈旭麓:《“因袭”、“规抚”、“创获”——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论纲》,《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

“离异”到“回归”的曲折历程。这种回归,是一个从否定到否定的过程,是一个辩证的升华。他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吸收利用表现为:(1)继承和发扬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和重民思想;(2)吸收了儒学“大同思想”的因素;(3)对儒学所确立的某些基本伦理道德观念的继承、改造和利用。持异见者指出,孙氏从来不是“孔孟的传人”,他择取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带有很大的实用性质,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晚年就中国固有的道德、旧政治哲学发表的意见,“带有浓厚的感情成分,有些甚至是即兴式的呼吁和发挥”。

(七)关于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思想

有说孙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提倡开放主义、主张利用外资的集大成者和先行者”。其“开放”范畴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近代开放思想已经达到了比较完备、比较成熟的阶段”。有说“把孙中山主张开放当成学习西方的同义语,对它的内容扩大地理解为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诸方面,甚至连‘以俄为师’也纳入其中,却未必是恰当的”。

这一阶段的特点为:(1)研究方法有所更新,既有系统的历史

章开沅:《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

黄明同:《试论孙中山开放文化观》,《“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李侃:《孙中山和传统儒学》,《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

周兴樑:《吸取、融贯、创新——略论孙中山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李时岳:《评“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曹均伟:《孙中山的“利用外资”思想》,《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郑学益:《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黄彦:《论孙中山的开放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分析,又兼比较研究;(2)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一些专题研究有所深化;(3)学术论著初现规模化,此期间发表论文不下 900 篇,出版专著 50 余部;(4)学术氛围宽松化,不同的观点相互切磋,尤其是能够客观地吸收、评价台湾学者的成果,促进了研究水平的升华。

第四阶段(1991- 1999 年)

孙中山研究的生命重在创新。90 年代以降,孙学研究领域面临着如何在原有基础上深化拓展的问题,学者们深入思考,另辟蹊径,使之继续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此时段的热点有三:

(一)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

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结合起来研究是 90 年代的一大特色,1996 年在广东召开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则是这一论题的大阅兵。论者指出,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近代化思想,它既表现出与欧美各国近代化常轨“从同”,创建民族国家的认识,又包含在社会发展上迎头赶上但避免其弊病的“超越”思想。有的强调其近代化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挣破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枷锁是前提;实业化构成方案中心;民主政治等同于杠杆;科学、教育和文化当是必要条件;正确的文化取向则是关于思想导向、精神动力和智力依托的重要关键”。近代化的基本目标,“即是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孙氏的“全部革命活动和斗争,都是围绕着民族解放与发展生产、实现近代化这两个宗旨去进行的”。其近代化思想“是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中

刘学照:《“从同”和“超越”: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特色》,《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上册,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张磊:《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上册。

最先进的,没有或很少有人超过他”。

关于政治近代化思想,有云“孙中山不仅是第一个提出并始终坚持要在中国实施民主立宪政治制度的伟大民主革命先行者,而且是在中国传播近代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先驱”,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并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联合而成的党作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的国家政权思想”。有云其思想代表了近代政治思想的高峰,宣告了儒家政治思想统治的终结,是近代中华制度文化的新建构。

关于经济近代化思想,一曰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构成了孙氏近代化方案的经济模式,“依靠国家力量”、“由政府总其成”是方法,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是重要途径。其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是民生主义,特点是以三大港口为增长极,以沿海为重点的梯度开发的区域发展战略;以港口为点,以铁路、水路、公路为轴线的点轴式开发模式;以交通、运输、原材料和生活资料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产业发展战略。

学者们还从近代化角度具体探讨了孙中山在社会、农业、教育、法律、科学、军事等方面的思想。

(二) 孙中山与中西文化

此一研究在80年代的基础上有所展开。关于其构成的特点,有云孙氏对待中西文化前后差异较大,辛亥前后,他主张吸取西方近代文化,以对封建文化进行彻底的改造;“五四”后,则提倡恢复

刘大年:《关于研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问题》,《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上册。

韦杰廷:《孙中山三民主义历史地位论》,《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上册。

陈华新:《论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上册。

鲜于浩、田永秀:《试论孙中山的经济近代化方案》,《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上册。

郭灿:《孙中山经济发展战略的再认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上册。

参见《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上册。

和弘扬民族文化。有云其文化思想的主旨是融合中西,兼收众长,走文化创新之路,他既不是完全离异传统的全盘西化者,也不是单纯固守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说其晚年有向传统文化“回归”倾向有失偏颇。关于孙中山与西方文化,有云孙氏在近代文化变革中基本上还停留在主张采纳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经济制度这一层面,而偏少主张对以个性原则为基础的近代思想学说这一更深层次的精神文化的吸取。关于孙中山与传统文化,有说孙氏长期客居海外,这决定他所理解的主要是经西方文化“过滤”后的传统文化;虽然他对传统文化契合处不少,但“时装洋化”的现象也难免存在。其一生对待传统文化既有一以贯之的坚信,又有因时而变的权通,这种态度使他与反传统主义及文化保守主义区别开来。

(三) 孙中山与日本

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孙中山与日本》按时间顺序研究了孙氏在各个重要时期与日本各界人士的复杂关系,认为:“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期待日本援助,是利用外援以达到革命目标,而日本方面,尤其是军部和浪人,无疑是妄图利用他们的被支持者,达到对华扩张的野心”,“两者的根本目的始终是对立的。但是,两者在部分问题利害上有时又暂时一致,即两者为实现各自的目的,其手段和方法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时一致”。这说明孙中山在政治上是理想主义,而在实践上又往往表现出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赵春晨:《再论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王垒:《传统儒学与孙中山对民族文化素质的认识》,《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3期。

桑兵:《孙中山与传统文化三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俞辛「:《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值得特书一笔的是1996年10月第一批孙中山基金会丛书的问世:金冲及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张磊的《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黄彦的《孙中山研究和史料编纂》、姜义华的《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段云章的《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李吉奎的《孙中山与日本》、林家有的《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邱捷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刘曼容的《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李志业等编译的《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这些书大部分为上乘之作,反映了当前的研究水平和新进展。其他如莫世祥的《护法运动史》、段云章的《放眼世界的孙中山》、黄明同、卢昌健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周兴樑的《孙中山的伟大思想与革命实践》等,亦不乏新见。

90年代的孙中山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1)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如社会思潮、心态研究等均有涉及;(2)研究难点有所突破,如孙中山与日本研究喜见几本力作;(3)研究队伍、论著数量仍在稳定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1)除近代化论题外,争论热烈的、新颖的观点不多,重大理论问题鲜有突破;(2)某些论作质量堪忧,存在溢美、抄袭、炒冷饭等现象;(3)研究队伍亟待年轻化。

结 语

50年来的孙中山研究,与近代史其他领域相较,成果是喜人的。但还存在着隐忧与不足,亟需我们去克服与拓展。

第一,研究需在新的理解中拓展视角。比如我们拿“国情”这个概念介入孙中山研究,就应考虑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集团、社会心理等层面去拓宽思维,把孙中山置于当时社会的广范围和多层面去研究,即大至“环境”、中及“集团”、小到“心理”,通过层层解剖,去透视孙氏思想与实践的真貌。又如孙中山与军阀的关系,孙

氏与军阀之“个体”和“群体”均发生过关系，与“南”和“北”的军阀都有过接触，早年与晚年情景各异，顺势与逆境心态不同，“幻想”与“策略”表里交织，如何“理顺”孙氏与近代军阀的关系？倘能从“环境”、“集团”和“心理”去深探，所获当不会肤浅。谈到社会心理研究，章开沅教授较有心得，他发现，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这三代领导人中，存在着历史紧迫感和变革急性病相互伴随着出现的连续性。再进一步，就是探讨这样的社会心理产生的历史根源。领导者为了赢得群众，往往作出过高的许诺，民众则对这些许诺的实现也抱有过高的期望，这对领导者来说，便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据此容易采取超越现实许可范围的急进政策，急进政策容易失败，其结果必然是领导集团和意识形态的急遽更替，而新的领导集团和意识形态，又往往给民众以更多更高的许诺，并使民众对革命和新政权的期待提到更高、更紧迫的境地，而这种无形的心理压力，使新的领导者更趋向于采取超越现实的急进政策。这种带负面效应的循环反复，就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屡屡受挫的社会心理根源。若从这一视角去审视孙氏的思想与实践，对一些难点、疑点的理解或许会深化一些。

第二，研究需在结合国情中尝试静动融贯的模式。以往孙中山研究的论作，静态研究（从史料到理论）的多，动态研究（从理论到现实）的少，静动融贯的研究模式更为罕见。弘扬孙氏之思想与精神，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将本世纪的伟人伟业薪尽火传，继往开来。由此而展开，诸如孙中山身后政治流派之演变脉络趋向，即对胡汉民、戴季陶、周佛海、邵元冲、甘乃光、杨幼炯、崔书琴、叶青等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解释与影响，均不失为孙中山研

章开沅：《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思考》，《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究静动融贯模式的对象。

第三,研究者的目光不应局限于孙中山生活的年代和他所试图解决的中国的具体问题。这可从两个层面去理解。首先,孙氏毕生矢志以求和为之奋斗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仍然是世界大多数要求民主进步的国家面临的主要课题,具有现实意义,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应是继续崇奉的准则。独立的课题始终存在,而民主和富强是无止境的。所以,孙中山研究在时空两方面具有跨时代和跨国度性质。其次,孙中山既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又是世界性人物,且堪称世界巨人,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思想和活动局限于中国和亚洲,而是与世界结合,足迹遍五洲,友人满天下,他把自己的活动融于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进步人类的斗争中。他融贯中西之思想,远比孔子思想合乎当今世界之潮流,产生于农耕社会的孔子思想于今仍可以与世界文化对话,那么孙中山的文明理念由“因袭”东方和“规抚”西方而“创获”,其“世界价值”比儒学更胜一筹,理应旗帜鲜明地登上国际学坛,与世界文化对话。

以上片言,只是举例,不免有失偏颇,敬祈识者正之。

〔作者王杰,1951年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广州 510620〕

【责任编辑:谢维】